



新时代与当代军旅诗的发展

□刘笑伟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对于诗歌创作而言,思想观念也应该进入新时代。

进入新时代,中国诗歌也要产生与伟大时代相匹配的“大诗”,也要诞生能够见证这个时代的杰出诗人。按照我的理解,新时代诗歌,其内涵是中国新诗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产生的诗歌;其关键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其使命是弘扬中国精神,讴歌中国人民在追梦逐梦的历史进程中展现出的精神风貌;其目标是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诗词特别是边塞诗是最具阳刚之气、最具理想风骨的那部分。我国的《诗经》《楚辞》里,就有不少军旅题材的诗歌,《全唐诗》更是收录了2000余首边塞诗。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重要题材之一,思想深刻、想象丰富、极具艺术感染力。强盛的唐帝国为边塞诗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边塞诗也同样为初盛唐提供了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如果没有边塞诗,唐王朝就不是完整的唐王朝,其光彩要大打折扣。在历史长河里,边塞诗人们留下了无数令人回肠荡气的诗句,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具有独特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风骨,具有崇高、阳刚、壮美的美学品格。可以这样说,边塞诗从一个独特角度撑起了中国诗歌的精神支柱,堪称世界诗歌史上的一道奇观。

百年前诞生的中国新诗,继承了中华文脉的爱国主义传统,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为中国新诗的重镇,军旅诗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都挺立在时代潮头,有效地激励着中国军人弘扬爱国精神,彰显英雄气概,培育尚武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也为全社会提供着奋发进取的精神力量。

军旅诗人们应该深刻认识到,正如边塞诗之于初盛唐一样,军旅诗是新时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诗歌繁荣发展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进入新时代的历史阶段,参与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新时代文学和诗歌创作的振兴,是军旅诗人的重大历史责任。

进入新时代,军旅诗为现代诗的繁荣发展,在语言形式、审美风格、文本探索等方面又增添了新的活力。新时代的军旅诗创作,在传承中国诗歌优良传统的同时,怎样才能直面时代变革、引领诗歌创作、创造传世诗篇,成为军旅诗人需要关注和解决的现实课题。

“一秒钟都不脱离这个时代之外”

与时代脱节,与人民绝缘,是现在诗歌创作的通病。一段时间以来,诗歌界放弃了我大追求小我,放弃了现实追求内心,过于讲究怎么写而不讲究写什么,不同程度存在着远离时代、不接地气、喃喃自语、不知所云等问题。造成的结果就是诗歌越来越“小众”,越来越成为文字游戏和“杯水风波”。诗歌评论家谢冕在《中国新诗史略》一书中,对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失望:“失去了精神向度的诗歌,剩下的只能是浅薄。同样,失去了公众关怀的诗歌剩下的只能是自私的梦呓。”应该说,这个评价是对当代中国诗坛自我陶醉的一个“当头棒喝”。其实,新诗诞生之初,白话诗很好地继承了从古诗词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其精神是“人世”的,既有《女神》对创造的讴歌,也有《死水》对社会的嘲讽,还有《大堰河》对普通民众的深刻同情。朦胧诗之后,中国新诗似乎越来越远离古典传统,主流价值和大众生活,逐渐向内心的独白、日常生活的扫描和小众化

2018年10月,王万举所著《文化创意创意学》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与作者此前出版的《文学艺术创意学》《文化创意学》,共同组成了文化创意学“三部曲”。历时三年,三部专著的陆续出版,标志着作者对文化创意学学科体系的系统化研究和建设初步完成。三部专著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深刻总结了自新时期文艺失却轰动效应以来,文艺和文化形态的发展变化,提出了建立“文化创意学”学科研究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界定“文学艺术创意”“文化创意”“文化产业创意”,铸牢学科基础概念为起点进行逻辑展开,结合对创意实践成果的分析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论点、新思路、新方法。

社会科学成果的学科体系性,既表现为命题的真实性、关联性、逻辑性和系统性,也表现为论题对实践的依存性和服务于实践的有效性。三部专著的学科体系性建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感性的具体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以学术创新的勇气从实践发展中发现和梳理新的学科体系创立的方向。“创意”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逐渐成为热词,形成了“文化创意”“创意产业”“创意经济”等新概念,与此相关的理论著述、科研单位、教学单位和实践机构不断创生涌现。作者将“文化创意”提炼、转化并提升为文化的创新理念和“文化创意学”的基础概念,赋予其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动机”和“方向盘”的意义,完成了三部系统性的专著,显示出开拓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文化创意”作为“文化创意学”(包括文学艺术创意学、文化产业创意学)的基本概念,并非“灵光闪现”的结果,而是社会生活的赋予。1993

新时代催生新使命,新使命指引新方向。今天,站立潮头,引领潮流,打造精品的重要历史地落在了军旅诗人的肩上。只要军旅诗人们认真学习、躬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拥抱时代,努力创作,就一定能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无愧于伟大人民军队的传世诗篇!

发展,在美学风格上表现为越来越口语化、口水化、庸常化,造成的结果是,一些诗歌越来越远离时代、远离人民、远离生活、远离崇高,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习近平总书记说:“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这句话对于当代中国诗坛,具有巨大的提示和指导作用。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军旅诗理应成为强国强军伟大时代的风向标。必须指出的是,与中国军队取得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巨大成就相比,我们的军旅诗创作也和当代诗歌一样犯着“脱离症”,远远落后于火热的强军实践。如果一个当代军旅诗人的诗中,看不到迈向世界一流军队的矫健身姿,听不到先进武器装备竞相列装的蓬勃心跳,感受不到浴火重生的军队实现强军目标的情感迸发,还奢谈什么军旅诗的突破?谈什么军旅诗的地位和作用?用诗讴歌和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是军旅诗人的神圣使命,也是军旅诗人的庄严答卷。谁这个答卷回答得好,谁才会在诗中留下自己的身影。

新时代的军旅诗创作,要理直气壮地唱响时代主旋律。在传播我党我军的价值观方面,军队作家一直走在前列,军事文学也一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最阳刚、最正大、最富于理想、最振奋人心的部分。作为军旅诗人,要发挥好这个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带头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始终坚定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带头处理好诗歌创作与时代的关系,在书写时代中找到自己的方位,深入到部队火热的生活中去,忠实记录中国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伟大实践,紧紧追赶强军兴军的铿锵脚步,让自己的作品充满艺术理想,充满生活气息,充满硝烟味道,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诗篇。

注意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

当代诗坛还有一个通病,就是“言必称希腊”:大讲借鉴外国诗歌,不讲继承古典诗词传统;重视对外国诗歌、诗人的研究,忽视对古典诗词应有的尊重。现代诗里食洋不化的现象比比皆是,连外国诗中为照顾韵律需要的分行也基本照搬过来,不问青红皂白,生硬分行断句,早已泛滥成灾。诗歌越来越失去意境,丢失了语言的精妙,更不要说内在的仪式感和音乐性了。更为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很多诗人是学习和模仿译诗进行新诗创作的,而现在译诗本身就存在着诸多乱象和问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我们的文化血脉,是我们民族最大的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只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在党的十九大上,他再次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忘根本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华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等精神力量,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有着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作为军旅诗人,要传承好中华文脉,“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要自觉从传统中寻找根基、血脉、方法,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让汉语诗的美在军旅诗中优雅绽放。一个诗人能够称得上伟大,就必须对丰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作出杰出贡献。屈原的《离骚》、但丁的《神曲》是如此,歌德的《浮士德》、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也是这样。当代军

创建文化创意学的学科体系

□张采鑫

年,中国文化产业化进程开始,“文化创意”工作从文化产业具体形态和具体项目中逐渐分离和独立,之于文化产业的重要性愈加凸显,独立或半独立的文化创意专职人员构成新的职业阶层,“文化创意”日趋形态化了。作者高度关注“文化创意”对文化建设特别是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开始研究“文化创意”是什么、有没有、文化创意能力能否培养、“文化创意学”有无实践需求及其能否构成学科体系等问题。可以说,“文化创意学”这一学科体系的构想和创立,是作者长期追踪文化产业发展实践,并对其进行不断分析研究、进行理论总结而形成的。

二、遵循“历史进程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文化产业创意学》开宗明义讲“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将“文化创意”从开始形态化(外化)的文化事实(1993年以降的文化产业化)向上追溯,归结为审美产生的人类物态化活动,将其源头置于人类劳动、物质生产和社会实践即马克思阐述的“自然的人化”。如果说,从第一把石斧到第四次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进程,那么从“发言为诗”“手舞足蹈”到哲学、宗教、文艺、社会意识形态的演进则标志着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两个文明之总和便是所谓“文化”,它是实践的产物或者实践本身,反映着文化创造从物质生产独立出

来的特点,人类意识逐渐分化;反映着文化产业化的特点,文化创意逐渐形态化;反映着实用物品艺术化的趋势,文化创意与科技研发相结合势在必行。有了逻辑的与历史的一致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指导,“文化创意学”的许多创新观点便不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基于历史(现实)的科学抽象和概括。

三、将文化形态和物质形态对比,找出二者的共性和区别,以对文化形态特殊矛盾性的研究作为文化创意学的研究对象。新的学科体系能否创立,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特定的研究对象是否真实存在,是否独一无二。而寻找研究对象的工作,一般从与研究对象相近形态的对比中进行。物质形态的发展是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或可说是科技与生产的矛盾运动。文化形态的发展,是文化创意转化为文化生产的过程,或可说是文化创意与文化生产的矛盾运动。因文化产业的兴起而导致的文化创意的形态化、独立化、职业化和专业化,使这一矛盾运动的轨迹愈加凸显。文化创意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文化创意有没有,是什么的问题,就是文化创意的社会实践如何可能的问题,就是文化创意如何与科技研发共同作用于产业发展和产品生产的问题。作者把文化创意学划分为“文学艺术创意学”“文化创意学”和“文化



产业创意学”,所依据的同样是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在这个体系中,文学艺术创意被视为文化创意的核心,与其他文化形态的创意(狭义)构成“文化创意学”(广义)的一体两面;“文化产业创意学”则专门研究文化产业化进程中文化创意(广义)的地位、作用以及社会实践的问题。作者用动态视角把不同的研究对象联结起来并由此推出新说。例如,他认为文化是文学艺术通过接受和物质载体的社会化延伸,“艺术与文化”的反馈产生一个巨大的“亚艺术体”,它是后工业化社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事实”;文化产品生产过剩的解决、对网络文学的认定、如何将审美由静态观照引入物质生产等问题,都与这个“亚艺术体”的理论解析密切相关。

四、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不仅需要文本中各要素形成一个整体,还需要理论与实践能形成有机互动,能够回到实践中去继续接受实践检验并服务、指导实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

当下的文学创作在数量上蔚为大观,达到了现代文学无法比拟的创作速度和数量,质量可圈可点。作为对文学创作的肯定文学评论,用文学的方式主动有效地去建设思想文化阵地,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

文学评论应和文学创作一起“凝心聚力、同心筑梦”,一道坚持文学自觉和文化自信,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坚守文学创作的道德高地,自觉承担起繁荣文学创作的历史使命,自觉抒写真情为民的文学精品,为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贡献力量。

增强服务大众的意识,文学需要走向社会、服务人民群众。坚持服务大众,把优秀的作品推介给读者,歌颂人民、鼓舞群众,是文学评论要树立的价值导向。用文学振奋民族精神,是文学应担当的历史使命。勇于创新创造,用不忘初心的态度坚持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是文学评论实现社会价值的根本途径。坚守艺术理想,用先进文化促进民族团结,是评论家积极立德立言的职业操守。

文化是一个国家与民族核心价值的重要支撑,弘扬、传播先进文化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和崇高使命。国家和民族存在的标志就是它与众不同的核心文化,文学作为文化艺术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有力传媒。作家和评论家的社会属性,决定其必须承担起传播文学力量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使命。

文学仅有作家不行,还要有广大的读者和文学爱好者,文学评论就是要搭建广大读者和作家之间的桥梁,积极发挥优秀作品的推介和传播功能,扩大文学的社会影响,让更多的人热爱文学、传播文学、从事文学,从而夯实文学事业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

坚守文学评论的时代价值与批评精神。把握文学评论的思想之本、舆论之场、文化之魂的价值判断,积极发挥评论对于创作、阅读的促进和引领作用,通过对文学作品思想意义的揭示和对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理论背景的分析,对新时代的审美潮流、精神追求、价值取向等起到导航作用,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作家和广大读者对文学品质的追求。

重视文学评论的功能。白桦先生说“在文学评论中我写的不是你,我写的就是我”。从创作论的角度进入文本,从评论进入理论继而指导实践。文学评论立足于对作家文学作品的阐释、评价,有效激活了一种动力性、引导性和激励性因素,对作家艺术潜力的确认、创作道路的总结、发展方向的调整等起到规范与指导作用。

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与现实,当前的文学评论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是,传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价值观念,努力发挥文学评论的社会导向功能,在鲜活真实的文学审视中践行评论者的专业立场和批判精神。

总结和探讨文学创作规律,捕捉文学新动向新思潮。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复杂的精神生产,是作家对生命的审美体验,通过艺术加工创作出可供更多读者欣赏的文学作品的创造性活动。

作家的主要精力是创作而不是理论总结,评论家的精力重点放在理论思考与作品评价,理论与评论理应立足于创作实践,而深入调查、深入实践是获得创作体验与创作经验的最佳途径。指导创作实践无疑是文学批评的主要功能之一,对于作家而言,或许更需要一既既有创作经验,亦有理论素养,同时具有较高文学鉴赏能力的批评家写出能够指导创作实践的批评文字来。

对文学创作规律的认识与思考,要求评论家能够真正地懂创作,非常清楚作家创作的生产过程、创作体验、艺术规律,在评论作品的时候,能够从创作论的角度进入文本批评,立足创作而超越创作,既有文本体验也有理论经验,在科学化、理论化方面向前超越一步,做出科学、理性、公正的评价。

直面文学的问题意识,重建文学评论的公信力。应该清楚当下文学评论的问题日益凸显,真正具有问题意识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少,文学评论的危机越来越大。有的评论文章往往喜欢从文化批评、审美批评的角度而不是从创作论的角度进入作品品评,这是一种比较保险的批评方式,从外围自说自话,隔靴搔痒,难以中的,尤其不能切中创作问题的要害。

对于创作而言,作家一方面希望能从评论文字中看到创作思路、创新技巧得到证实与肯定,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得到中肯的批评来进行反躬自省,若能达到解感疑惑,则会拉近创作与批评的距离,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就绝不仅是简单的利用和对立关系,而是争鸣与共鸣的关系。

让文学评论在与创作的互动中,传递信息、激活思想。如果文学批评能够摒弃媚俗的文字或者枯燥乏味的讲章,重建文学评论的公信力,也是文学评论重新整合并再次崛起的机遇。

创作史与批评史是文学史的两条车辙,一部文学史同时也是一部批评史。优秀的文学评论能够敏感地捕捉最新的文学思潮、创作倾向、文艺动态,及时地关注,深入地研究,并发出声音进行有效地引导,不但会对创作者制定或修正他们的创作计划提供有益的帮助,而且为决策部门制定相关的文学政策提供资料依据与参考。如果能及时有效地对那些与时代同呼吸的作品进行评论,最终做出具有文学史意义层面上的评价,将是评论家的理想与诉求。

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基于此,三部专著均编入了“创意方向”单元,或从文化产业的特定业态着眼,或从特定艺术品种着眼,分别依据文化创意学原理指出它们创新的突破口。作者指出,文化创意的社会效果不都是好的,不有效鉴别、批判、遏制不良文化创意,就难以实现文化创意产业化、产品化过程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这些观点,都体现出“文化创意学”学科建设的实践品性。

五、三部专著还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教学体系。文化创意学旨在培养人的“无中生有”的文化创新能力,因此,作者在总结文化创意人才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围绕创意能力的形成和培养设立了“创意例说”“文化创意实现的社会机制”“不良创意批判”等单元,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述如何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创新,提出“文化创意能力的养成需要善的情怀”“情感是文化创意的发动机”等观点,系统梳理了文化创意学转化为教学内容的一些重要元素。

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立足并扎根于现实生活,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标,是理论中国化的核心价值,失之于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就会失去源头活水。“文化创意学”追踪着实践的发展脉络和轨迹,其理论内容永远在不断创新、总结、创新的道路上。从这一点上看,王万举的三部专著对于深化文化创意学理论研究、催生新的学术成果都有可资借鉴的意义,其开创性价值值得充分肯定。

坚守文学评论的时代价值

□赵兴红